

把戰爭歷史寫回來：以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二戰下的臺灣人」特展為例

陳亞柔*

摘要

戰爭歷史常以國族立場書寫以形塑一致的認同，並關注政治與軍事領袖事蹟，鮮少記述大眾的戰爭經驗。近年來關於大眾的戰爭記憶之研究，有助於戰爭歷史的敘事跳脫國族主義的二元對立，看見戰爭的複雜性，並反思背後的國家暴力，對於在博物館中展示戰爭歷史，更提供我們思考在當代理解戰爭歷史、紀念與傳承戰爭記憶的意義。

本研究以 2015 年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二戰下的臺灣人」特展為個案，展覽以大眾的戰爭相關物件和記憶，呈現戰爭中的大眾，以及大眾觀點的戰爭。博物館在籌備過程中，規劃志工讀書會作為方法，讓志工協助梳理大眾的戰爭記憶並參與詮釋。本研究以大眾史學的理論為基礎，並且透過與策劃團隊、志工進行深度訪談，就特展的籌備過程與展示文本進行分析，說明博物館

*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碩士

來稿日期：2024 年 6 月 26 日；通過刊登：2024 年 10 月 18 日

如何透過大眾史學的實踐，呈現多元的大眾觀點以及超越國族框架的戰爭歷史書寫。

關鍵詞：戰爭記憶、大眾史學、戰爭歷史展示、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歷史書寫

一、前言

當代的博物館被期許能主動面對社會議題與大眾對話，近年來臺灣許多博物館積極投入公共議題、困難歷史與人權議題的研究，並透過策展能讓觀眾接觸這些事件，引導他們進一步思考和持續關心。尤其談論關於臺灣本位的戰爭歷史的議題，除了悼念先人與和平教育之目的，更有填補過往缺失的歷史記憶來進行歷史書寫的意義。

為何需要臺灣的戰爭歷史記憶？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例，在臺灣社會中存有著「抗戰勝利」與「戰爭終結」兩種截然不同的認知差異。汪宏倫（2014）援引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 2009）和厄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 1974）的理論，進一步提出所謂的「戰爭之框」（frames of war）包含了兩層意涵，一個是指戰爭所創造的社會結構，另一個則指戰爭改變或創造了一個框架（認識論），成為人們用以認知、詮釋戰爭以及戰後的遺緒。戰爭之框大多由國家有意識地建構與修正，透過教育與文化媒介傳播，將這個認知延續至戰爭結束的今日，轉換成國族之框，經由教科書、小說、電影、紀念儀式與博物館中的歷史書寫，繼續影響當代人們對於過去戰爭的認知。

汪宏倫（2014）指出，日本設定的大東亞戰爭的框架，戰後在臺灣被改變成了迥異的抗日戰爭與反共戰爭的框架。在這個框架與再框架（reframing）的過程當中，讓臺灣在日本殖民時期的戰爭記憶散佚於框架之外，連帶戰爭的遺緒也一併被淡忘，也因此承載著這些經歷與記憶的人們無法進入公共的視野當中。

此外，回顧在臺灣的戰爭歷史展示，除了紀念性的特展之外，幾乎只見於軍事相關的博物館，以軍事文化為核心的展示脈絡，慣性地從國家與民族的立場出發，為保家衛國的先烈們致上最高敬意，框構出黑白分明、立場明確的榮光敘事。但如果社會上僅有軍事視角出發的戰爭敘事，難以向大眾傳達戰爭涉及國族政治的複雜性。戰爭不只屬於國家，還包含所有被捲入戰爭的人，所有

站上戰場的士兵都是血肉之軀，被戰爭摧毀的人生不計其數，如何讓與戰爭已然遙遠的世代對艱澀的議題有感，並且對得來不易的和平有更深刻的體悟，當代社會必須面對臺灣二戰記憶存有歧異的事實，也需要有超越戰爭之框、多元且涵納衆生記憶的戰爭歷史書寫。當代的博物館如何從既定的框架中解放、讓臺灣的戰爭記憶重返公共視野，並提供更喚起共感的戰爭歷史敘事？本研究將考察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史博）嘗試以大衆史學（The Public History）的方法切入，設計讓大衆參與詮釋與書寫歷史的取徑，如何讓屬於臺灣的戰爭記憶被記得、被書寫，並且得以傳承。

周樑楷（2004）提出大衆史學三個層次的理解：書寫屬於大衆的歷史（history of the public），書寫給大衆閱聽的歷史（history for the public），以及由大衆來寫歷史（history by the public），意即以非官方的觀點來詮釋既有的歷史，呈現多元的歷史觀點，尤其有助於發掘過去被官方刻意壓抑之邊緣族群的歷史；透過歷史的通俗化，和創造面向大衆的傳播途徑，讓歷史與當代生活建立連結；重視歷史書寫的開放性，讓過去官方未知的歷史得以進入公共領域中討論。尤其強調並非只是在成果中呈現大衆觀點，應該要關注整個生產知識與書寫詮釋過程中，學者與大衆之間共享權威（shared authority）的重要性，意即一個多元、衆聲喧嘩的辯證空間存在。

2015年適逢二戰結束70周年，臺史博舉辦的特展「二戰下的臺灣人」，以二戰期間臺灣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受到的影響，以及戰後政權轉移時的境遇等爲題，旨在探討戰爭的多元記憶，並聚焦呈現大衆戰爭記憶，看見戰爭時的大衆，與大衆如何看待戰爭。展覽分爲兩部分，第一部分以物件來描述二戰期間的大衆，看見當時受到日本政府殖民統治的臺灣人爲了支援軍事行動，整個臺灣社會如何逐步被動員的情況；第二部則以節錄出版物、口述訪談中的大衆戰爭記憶，展示1945年8月15日，也就是戰爭宣告結束的那一天，人們的際遇以及所思所想。特別的是，第二展區的展示內容，是展覽籌備期間由臺史博透過口述歷史資料整理計畫與志工讀書會蒐集所得。

過去那些散佚於框架之外的戰爭記憶，1970年代起隨著本土文史研究熱潮、官方檔案解密以及民間口述訪談的梳理，將屬於臺灣日本殖民時期的戰爭記憶漸漸重新回到公共視野。為理解當時讀書會蒐集資料與策劃展覽的過程，筆者採用文獻分析、半結構式訪談法（semi-structured interview）蒐集資料。2014年這個「1945年8月15日：那一天 戰爭結束」讀書會，是由當時臺史博研究組組長謝仕淵初步提出的構想，並與當時為助理研究員的特展策展人陳怡宏討論後，設計出這個志工讀書會的模式，並交由研究助理王美雯負責安排與執行專案。因此，此研究的訪談對象為讀書會策劃團隊（兼策展人）的三位館員，與四位志工為訪談對象。

首先，與策劃團隊的訪談著重於以臺史博的立場思考以大眾記憶來呈現戰爭歷史的觀點，以及在前期文獻資料與物件蒐集的歷程，中期規劃讀書會與口述訪談的考量與成果，最後將資料轉譯為展覽過程；其次，受訪的四位志工都是當時較深度參與讀書會的成員，是在臺史博甫開館時就加入志工大隊的資深導覽員，他們對參與文化資產研究和博物館導覽十分有興趣。和志工群的訪談，則設定以讀書會的參與動機與心得為主。爬梳臺史博在籌備展覽過程與最終展示文本，如何設計出一種大眾史學的實踐模式，將相關研究成果呈现在展示中，以及運用大眾記憶作為博物館展示內容的特殊性與意義，大眾的戰爭記憶如何掙脫國族論述，尤其是過去缺席的邊緣族群，得以於公共場域中被呈現，達到歷史詮釋與書寫中的共享權威，讓戰爭回歸生命的多元對話。

二、構成大眾的視線：屬於大眾的戰爭記憶

根據臺史博2012年報所述，臺史博在開館前推動了幾項館藏文物研究與展示籌備計畫，「二戰下的臺灣人」就是其一，目的是研究戰爭時期的常民生活、城鄉差異下的動員經驗，並加上戰時文化統治、海外臺灣人戰爭經驗與戰爭小故事等過去學界較未關注的面向。當時臺史博研究組助理研究員陳怡宏為

「二戰下的臺灣人」的策展人，提到如何呈現戰爭中人們的觀點並且使之相互對話，是展覽相當注重的部分。

臺史博當初設定「歷史上的那一天」為命題，是「希望透過以『一日之歷史』、『一人之歷史』的觀點，累積出足以和化約性、整體性、後設性的史論，再對話的材料。」（王美雯、陳怡宏、謝仕淵，2015：1），期以從多數人的記憶中描繪戰爭的群像，更將敘事的觀點從國家拉至個體的經驗，也就是由多個個體記憶所構成的大眾觀點。

從個體戰爭記憶解讀臺灣二戰歷史為何重要？必須先了解臺灣二戰歷史的特殊性。陳怡宏（2015）指出因為戰後臺灣由中華民國接收，原先的殖民地戰爭歷史記憶被壓抑，另一方面，經歷二戰時期的臺灣人們，不同世代對於戰爭的觀點與立場也有所差異，¹也揭示了在二次大戰的總體戰形態下，舉國上下從精神、物資、人力等方式投入戰爭，不同世代的臺灣人對於參與戰爭的態度，以及最後天皇宣布戰敗時的悲慟或平淡，還包含了國民政府的部隊登陸接管時的欣喜或不安，交織成複雜的歷史記憶。

基於前述的特殊性，臺史博從大眾記憶來研究的二戰歷史，涉及兩個層面的意義，第一個層面是回應世代間具有差異性的二戰歷史觀點與記憶。1945年8月15日這天發生了玉音放送的天皇廣播宣布戰敗之事件，在這個事件發生的時間點，某人處於某個地理空間、身分職責，產生了某種情緒或展開某種行動，為了理解對方為何產生此種情緒／行動，則必須再將時間軸拉至更早之前，理解他個人的過往經歷以及身分背景，此時即可與前述世代的認同差異、殖民地的統治政策與戰時體制等連結。「一日之歷史」宛如一個水平切面，看

1 陳怡宏以周婉窈（2003）引用Kerr（1974）對二戰時期臺灣世代的分析為例，將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人口組成大致分為老一代（乙未割臺時為青壯年）、中年（1885至1915年間出生）與新生代（1920年代後出生）。老一代經歷清朝統治與割讓臺灣給日本初期的動盪不安，新生代則在1920至1930年代間，日本統治最安定的時間度過童年，並有較高比率的人接受過日本公學校提供的近代教育，也造成新生代對於國家、民族、歷史的認同與價值觀，與老一代相比有明顯的差異。

見每個人情緒的差異性，再接續著「一人之歷史」，沿著時間的縱軸，往前看到個體的生命經歷，而往後從當代的視角看待終戰記憶，也會因為戰後際遇而影響對終戰記憶的觀點。

第二個層面是延續臺史博一直以來所關心的大眾歷史與常民記憶。歷史的書寫者大多是菁英階層的少數人，常民的記憶在過去難以留下文字紀錄，而在過去論述時常被視為同質的、多數的「大眾」，應找出其多元性，以及具體指涉、組成的群體，了解這些大眾究竟指稱何人，又為什麼能夠成為集體意識的代表。此時，包含自傳、回憶錄與口述歷史等記憶的史料，即在這個議題當中成為相當重要的研究取徑。

根據館刊與訪談的陳述，展覽的展品包含三個不同來源，一為臺史博蒐藏的二戰文物，二為與臺灣歷史學會共同合作「特展『二戰下的臺灣人』戰爭記憶口述歷史資料整理計畫」，三是針對1945年8月15日多元記憶的「歷史上的那一天」舉辦的志工讀書會計畫。

（一）大眾戰爭記憶的物件

要策一個以大眾戰爭記憶為主的展覽，最大的困難之一即是民間觀點的史料缺乏。在訪談裡陳怡宏以日本殖民時期的報紙為例，提到官方創辦的《臺灣日日新報》在當時公部門有意識地保存下有較完整的史料，相較之下民間自辦、偏向殖民地立場的《臺灣新民報》系列報紙卻所剩無幾。

其實這是臺灣歷史策展最大的問題。你在臺灣各個歷史時期，尤其日本時代跟戰後，一定是跟官方有關的，或是親官方、親統治者方面的資料會留下最多。（陳怡宏訪談，2021年4月28日）

展覽的戰爭歷史相關文物，大致可分為戰時生活物件、戰時廣告文宣、報章雜誌出版品、軍備武器、官方檔案文件、照片與戰爭紀念物。這些文物部分來自臺史博創館後陸續獲得民眾捐贈物件納入典藏，亦有透過購買管道獲得，也有不少民間照片或是航照圖等，來自國外檔案館藏的授權使用。

首先，臺史博從2000年開始陸續收到來自民間的文物捐贈，陸續蒐藏一些來自民衆捐贈的戰爭時期生活物件、照片、出版物或戶籍謄本等官方核發的文件等。部分捐贈者甚至願意捐出對於家族有特殊意義與情感的物件，如親人出征前的最後一張合照、戰歿士兵家書等遺物，這類戰爭紀念物的物件，也是戰爭相關文物當中最敏感、最難透過購買管道獲得的文物。在文物勘查階段由捐贈者敘述這些物件背後承載的個人經驗、家族故事等歷史記憶，更能呈現戰爭歷史當中生命史的尺度，並將個體記憶轉化為具有公共性的歷史記憶，更富有深刻意義。

藏品中還有一些戰爭相關文物是2014至2015年籌備特展期間大量從臺灣文獻會（現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秋惠文庫等單位購得，例如皇民化時期日本總督府對臺灣的宣傳雜誌《寫真報導》，書中提供許多戰爭後期的珍貴照片，呈現一種「由上而下」觀看殖民地人民戰時生活的視點。

除了國內的文物蒐藏與史料的收集，海外相關史料收集的進展也對這次展覽有助益。臺史博於2013年委託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進行美國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簡稱NARA）館藏臺灣二戰相關及美援時期產業相關紙本類資料調查研究，找到臺灣二戰相關的資料，尤其是美軍拍攝的航照圖、到臺灣民間拍攝的生活照片等，有助於了解當時各地受美軍空襲受災情勢。

筆者從展覽內容反向推導，經由這幾個蒐藏途徑的物件，呈現了展覽中的三個面向：戰爭背景與殖民地政策、戰時生活、戰爭紀念，來呈現那個時代的臺灣人為何、如何參與戰爭，以及因為戰爭而受到的影響。

（二）戰爭記憶的口述歷史資料整理計畫

在2008年即開始進行的口述歷史計畫「特展『二戰下的臺灣人』戰爭記憶口述歷史資料整理」，當時委託臺灣歷史學會進行，整理了市面上已出版的二戰相關的回憶錄、自傳、訪談錄等史料文獻的書單，並且進行口述訪談。在

這個計畫之前，早在1980年代起已經有許多學者進行如臺籍日本兵、少年工等口述訪談，但臺史博強調這次委託歷史學會進行的口述歷史計畫，希望不只以當時具有軍事相關身分的人們為訪談對象，而是廣泛納入不同性別、世代、職業與地域的人們，來呈現具有差異性、多元性的大眾戰爭經驗。

此外，也在後續的「特展『二戰下的臺灣人』戰爭記憶口述歷史資料整理」擴充案中，請學會拍攝戰爭記憶為主題的訪談影片，包含腳本撰寫、挑選受訪者與實際拍攝工作、剪輯等皆全權交由臺灣歷史學會處理，陳怡宏於訪談中提到當時開會討論拍攝影片內容時，臺史博希望著重強調臺灣人戰爭生活記憶的部分。當時學會規劃了五部影片，主題分別為：一、戰時城鄉經驗差異與動員；二、外地臺灣人的戰爭經驗；三、戰爭時期生活史的變化；四、戰爭時期文化統制；五、戰爭時期小故事。將14位受訪者²的訪談紀錄影片裡，敘述到相關的內容分別剪入各部主題影片中，並穿插臺史博提供的史料照片、影片檔案等。

博物館在檢視計畫成果時，發現了幾個問題。首先，必須意識到能夠書寫、受訪與出版回憶錄、自傳與訪談錄的回憶者，許多是教育程度較高的知識份子、社會地位較高或是因為具有某種特殊經歷的人物。在本研究訪談中，陳怡宏亦指出當時請臺灣歷史學會執行口述訪談時，以團隊既有的人際網絡，受訪者大致上與白色恐怖受難者和其家屬有高度重疊，這些受訪者的經驗許多由於其特殊身分而有與眾不同的戰爭經歷，是否足以回應博物館所期望的普羅大眾戰爭記憶，陳怡宏認為是策展團隊必須考量的部分。

另一方面，在拍攝影片的過程中，從既有的訪談者中挑選適合再訪和拍成口述影片的人，已經大幅度地縮限了可選擇的範圍，但是其中願意接受拍攝，或是答應授權給館方應用的受訪者又更少，因為大多數經歷白色恐怖事件的人

2 根據「特展『二戰下的臺灣人』戰爭記憶口述歷史資料整理」後續擴充案成果報告書，受訪者有李自娘、歐陽文、吳逸民、蔡焜霖、溫文勝、蔡玉珠、詹浮雲、嚴燦城、洪育樵、林秀幸、林秀美、林彥卿、劉心心、葉英堃等。

們，基於過去的經驗而無法放心地將自己的口述內容交給代表「國家」、「官方」的國家博物館，亦是潛在的困難之處。

（三）「1945年8月15日：那一天 戰爭結束」志工讀書會

如前述在資料收集中遇到困難，因此臺史博策展團隊更加期望在這次策展當中，能夠納入普羅大眾於戰爭期間的生活經驗與觀點。如前所述，在2014年由當時的研究組組長謝仕淵、助理研究員陳怡宏和研究助理王美雯3位共同主持「1945年8月15日：那一天 戰爭結束」志工讀書會，³並邀請8位志工參與，目標是蒐集關於1945年8月15日宣布終戰的這一天的記憶，整理出在不同的地區、年齡、職業的人們各自的終戰經驗。這個讀書會的模式也成為後續多次特展籌備時的一大助力，亦成為一種博物館推動大眾史學的實踐模式。

臺史博館員林佳逸（2018）提到甫開館即創立的臺史博志工大隊，其工作與國內外的博物館志工大同小異，不外乎是協助展場維護、提供民眾公共服務與幫忙館方行政工作，同時也是館內外教育推廣的重要人力。臺史博志工大隊的成員之年齡區間主要落在55至64歲之間，館員們發現志工們大多表示自己對於臺灣歷史有興趣，也觀察到一些志工們很積極地表達自己對於歷史事件或物件的看法。林佳逸認為從歷史研究的角度來解讀，高齡志工們主動分享親身經歷或所知所聞，是館方寶貴的研究資料，也因此成為後續讀書會規劃的動機。

臺史博研究組在2010年處理《獄中家書：柯旗化坐監書信集》出版工作時，在研究組志工們協助圖書室進行基礎史料整理的過程中，發覺志工們本身在處理歷史資料能力甚佳，同時也對博物館中的研究工作有興趣，已經初步思

3 後來臺史博延續「1945年8月15日：那一天 戰爭結束」發展出一系列志工讀書會，並正式命名為「歷史那一天」，但筆者發現在臺史博的簡報、官方網站、官方Facebook專頁上面未有統一稱呼，館員發表之論文與網路專文所用的稱呼也稍有不同，另有「歷史的那一天」、「歷史那一天」。本文根據2015年王美雯等人所著〈臺灣人的戰時生活物件與終戰記憶論文〉，沿用「歷史那一天」來指稱此系列之志工讀書會，而「1945年8月15日：那一天 戰爭結束」則用以專指籌備特展「二戰下的臺灣人」時的「歷史那一天」讀書會。

考與志工進一步合作的可能性（林佳逸，2018）。這個構想直到2014年「二戰下的臺灣人」特展的籌備時期，終於有機會實踐。

事實上最初規劃時，並沒有特別打算要以二戰作為讀書會主題，純粹是2014年正準備策劃「二戰下的臺灣人」特展，面對先前臺灣歷史學會整理出的書單，首先臺史博必須思考如何爬梳過去二十多年來關於臺灣二戰的口述歷史成果。此時，謝仕淵想到志工讀書會或許可以作為這次展覽的嘗試：

因為你說這個故事要有一個好的記憶點，然後要有一個你相信整理資料時不會有太多的落空的這個判斷。不然你讀十本，志工都找不到這裡面的訊息，大家也會覺得沒信心。我們那時候基於對過往研究經驗的理解，知道這個議題會有材料。（謝仕淵訪談，2021年4月22日）

臺史博策展團隊嘗試藉由志工讀書會協助特展資料的蒐集以提升籌備工作的效率，同時也期待能作為在博物館中實踐大眾史學由下而上、讓大眾參與歷史研究的方法。但考量到初學者的門檻，二戰史料的數量以及豐富度是現階段得以操作的主題，因此謝仕淵與陳怡宏、王美雯商量後，決定趁著這次展覽籌備導入志工讀書會的方法，請志工們協助尋找文獻當中的「一日之歷史」，以及梳理回憶錄、訪談錄中戰爭記憶有關「一人之歷史」的影響。

2014年10月策劃團隊舉辦第一次志工招募並辦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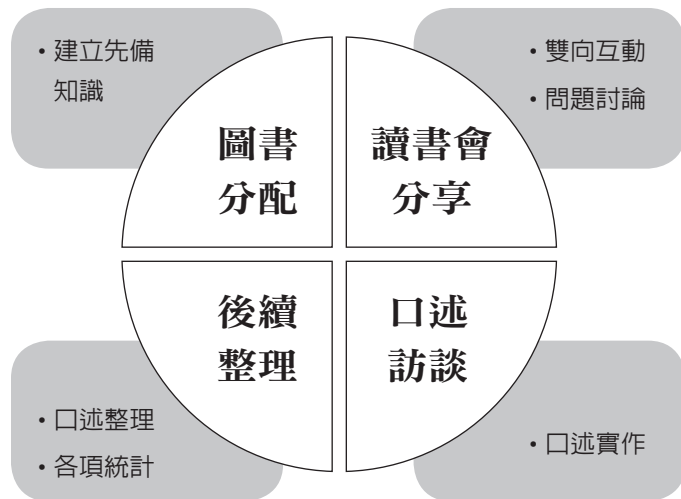


圖1 「1945年8月15日：那一天 戰爭結束」讀書會運作方式
資料來源：王美雯、陳怡宏、謝仕淵，2015，〈臺灣人的戰時生活物件與終戰記憶〉。

說明會，讓志工們了解館方的規劃與目的，共有8位來自不同分隊的志工們加入。「1945年8月15日：那一天 戰爭結束」志工讀書會的操作如圖1所示。

臺史博從先前委託臺灣歷史學會執行的「特展『二戰下的臺灣人』戰爭記憶口述歷史資料整理計畫」當中列出相關書目與影音內容，再加上圖書室藏書中與二戰相關的回憶錄、訪談錄等，統整成一份書單，一同分配給團隊成員們，請志工們在閱讀時將有關於回憶者⁴的身分背景、人生經歷與終戰那天前後的經歷，特別是有「聽聞戰爭結束」當下身處的時空背景，與個人心境、周遭人群氛圍等，一一摘錄並整理成表格資料。也藉此更深入了解歷史事件，以建立對於臺灣二戰歷史的先備知識和閱讀多元的大眾戰爭記憶，接著在每個月一次的讀書會中與眾人分享文獻的大致內容，以自己的觀點加以詮釋敘述，並與館員一同進行資料補充與討論。當志工們對主題有一定程度的熟悉後，便開始參與口述訪談的工作，完成的訪談錄與資料再交由研究員進行彙整與統計分析。詳細的分工如表1所示。

表 1 「1945年8月15日：那一天 戰爭結束」志工讀書會成員分工表

讀書會成員		工作
館員	謝仕淵（研究員）	事前引導、主持討論、主要訪談者。
	陳怡宏（助理研究員，策展人）	事前引導、主持討論、主要訪談者。
	王美雯（研究助理）	參考資料補充、口述摘錄、期程安排與聯絡窗口、主要訪談者、後續整理與統計。
志工	八位志工	口述摘錄、提供訪談名單、協助訪談（少數人會擔任主要訪談者）。

書目當中，包含已出版的傳記、回憶錄、訪談紀錄等相關書目與影音檔案。這當中可大致歸類出兩種不同的史料，一種是已出版的傳記、回憶錄與訪談錄，另一種是先前臺灣歷史學會訪談成果的訪談錄。

4 於本文中，指稱那些自傳作者、回憶錄與口述訪談等之受訪者，擁有戰爭記憶的人們。

筆者訪談時，王美雯提到當時規劃出幾個主題，請每位志工大概按照自己有興趣的面向來選書，例如有志工對於戰爭中的女性有興趣，就挑選以女性受訪者為主的回憶錄或訪談錄等。不過本研究對四位志工的訪談中提到，這部分仍然較開放，志工基本上就是按照自己的興趣或是較隨興地來選書，也不會特別限於某個主題的書。每位志工根據自己的時間安排，一個月大概處理3至5本。

筆者認為，志工們讀書會摘錄史料的過程，也蘊含了工作方法與歷史研究的內涵。首先，在閱讀時必須先建立志工們對史源（sourcing）⁵的認識，而想適切地了解事件，必須將史料安置於過去空間與時間之中將史料脈絡化（contextualization），⁶讓閱讀本身成爲一種培養歷史意識的學習過程，也能更有意識地閱讀過程中獲取關鍵資料。另一方面策劃團隊也勢必要設計出一個入門者得以施作的摘錄作業方式，不同的人做不至於有太大差異，同時又須對展覽詮釋多元的大眾記憶有意義。

由於志工們幾乎都非歷史學術專業出身，需要先了解如何閱讀史料以及熟悉相關的研究倫理。陳怡宏和王美雯都提到，在讀書會剛開始時，由陳怡宏和謝仕淵以歷史研究者的立場，告訴大家關於閱讀此類個人回憶記述的史料時，應有的心態與方法，尤其對於二戰議題，必須有同理心去看待不同時代的人們，從當下時空背景的社會條件影響，所做出積極或消極的行動與決定，而即使是同一個時代的人們，思想一定也會有差異。從事前的講解中，傳達史源的認識，以及史料脈絡化之重要性，先行建立歷史研究的素養。

關於摘錄資料的作業方式，策劃團隊設計了一個類似博物館登錄文物的表

5 筆者使用 Sam Wineburg 所著《像史家一樣閱讀》當中，對於閱讀史料的三項策略：探究史源（sourcing）、脈絡化（contextualization）和交互參照（corroboration）來辯證閱讀素養。史源意即了解歷史資料的來源，以及撰寫者、撰寫時間、資料的類型，了解這份史料的可信度。

6 承上，為了解當時書寫的時空背景，應將整件事情的前因後果納入考量，以確定歷史人物的觀點和敘述內容沒有被斷章取義。

格，讓志工們可以把回憶者的資料與記憶敘述填入各個欄位中。在資料整理的設計上，考量到志工們對於網路、電腦文書處理的熟悉程度不同，採取三種方式並用，第一種是設定 Google 表單，由志工們上網按照欄位填入資料；第二種是用 Microsoft Word 文書處理軟體設計出表格，在電腦未連接網路的狀況下仍能填寫；第三種則是用紙本表格手寫，王美雯會再根據他們繳交的紙本協助將內容鍵入電腦中並統整資料。

從他們規劃的電子與紙本表格中，規劃了如表 2 中呈現的欄位項目：

表 2 「1945年8月15日：那一天 戰爭結束」志工讀書會資料摘錄表格（筆者參考實際運用的電子與紙本表格內容整理）

回憶者身分資料	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出身地
	簡歷：學經歷、成長經歷
內容出處	1.實體書：著作者、書名、出版社、出版地、出版時間、頁碼。 2.網路資料：網址和檢索日期。 3.讀書會進行之訪談：訪談地點與時間、聯絡方式。
1945年8月15日 終戰那一天時的情況	
所處地理位置	臺灣、南洋、滿州國、日本、日本（大陸占領區）、日本（韓國殖民地）、中華民國、美國 其他
年齡	1~14 歲（1931~1945 年間出生） 15~29 歲（1916~1930 年間出生） 30~45 歲（1900~1915 年間出生） 45 歲以上（1899 前出生）
國籍	日本-臺灣、日本-原住民族、日本-在臺日人、中華民國、華僑 其他
職業	學生、學徒兵、少年工、看護婦、軍人、農、工、商、教師、律師、醫生 其他
如何得知終戰消息	廣播、報紙、無線電、旁人告知 其他
終戰的記憶	可包含回憶者之終戰前後的心情、當下心境、聽到的消息、周遭人物的反應、生活、統制及戰爭經驗

選擇使用表格而非一種敘述性的文字節錄，須仰賴志工們閱讀與萃取關鍵資料的能力。謝仕淵認為，在策劃團隊設計表格欄位的時候，事實上就已經將臺史博詮釋這些歷史資料的觀點隱含於其中：

因為你必須要讓那個閱讀轉化成為一個集體的資料的時候，他可以很清楚地知道什麼樣的資料要填到什麼樣的欄位。那那些欄位的屬性，背後是在反映你對於歷史詮釋的觀點。譬如說我希望能看到地點的差異性、我希望能看到世代的差異性。教育的差異、生命的差異性這樣……把欄位萃取出來的過程當中，其實你已經在對資料結構化了。（謝仕淵訪談，2021年4月22日）

筆者認為，從欄位的規劃看到策劃團隊對於大眾的戰爭記憶採取一種身分證式再疊加上空間分布的方式，但探究每個欄位屬性，事實上對應著當時日本對臺灣的殖民政策、戰時體制或是長久以來的社會風氣。而讓這些人會面臨某個處境，並且因此產生某種特定的情緒。例如所處的地理位置與職業能說明當時的戰時體制，人民為了支持國家戰爭而分別擔任什麼樣的社會角色，或者隨著組織調度來到其他的國家或地區。另一方面，職業的欄位中特別將學徒兵、少年工、看護婦、軍人等劃分出來，是當時受到國家政策影響、最直接面對戰爭的人，教師、律師、醫生則是社會菁英的代表，其中醫生也會至前線支援醫療傷兵，亦有高機率離開臺灣本島至其他地方，並且更能體會戰爭的血腥與殘酷。國籍的分類，更是直指殖民政策中對不同族群的差別待遇，以及從血緣、地緣形成不同的認同感。尤其面對相異族裔的人時更能反身性地感受到彼此的差別。

筆者檢視讀書會的摘錄內容，這些已出版或是透過臺灣歷史學會訪談獲得的回憶錄、自傳與訪談，是回憶者們以受訪時的觀點回顧過去的歷史事件所書寫、或陳述，藉此將個體的記憶化為文本，並出版使之公共化。在臺史博統整的過程中被彙整，以一種類似檔案化（archiving）的方式，透過資料結構化的處理來讓各種不同的集體記憶得以浮現，如女性、少年工、在臺日人、年長

者、歡慶或含淚地迎接終戰者等，意即臺史博認為臺灣的大眾二戰記憶能夠劃分出諸如「二戰下的臺灣女性」、「二戰下的臺灣少年工」、「二戰下在南洋的臺灣人」等不同面向，將一個抽象的「大眾」概念轉化為具體指涉的群體，精煉出得以構成大眾的指標性群體，重新建構一個得以對抗國族主義的、「大眾」的戰爭歷史之結構。

志工在摘錄的過程，一邊協助將這些記憶置入詮釋的架構中，一方面也透過大量閱讀與聆聽他人分享大眾的戰爭記憶，嘗試回到當下的社會脈絡、從大眾的觀點來感知二戰歷史的複雜性，也就是說，這過程本身就是一種學習，志工了解大眾歷史之研究方法以及臺灣二戰歷史的多樣觀點。

但不可諱言的是，正如謝仕淵所述，團隊所設計的資料表格已經將臺史博詮釋這些歷史資料的觀點隱含於其中，意即策展團隊對原始材料已有一套選擇與詮釋的邏輯，以及「不同的人做不至於有太大差異」的設計思考，志工觀點的缺席，對於原先期望由下而上、大眾參與的博物館方法尚有落差。

（四）屬於志工、屬於博物館的滾動式口述訪談方法

在累積一定的資料量，以及對於戰爭記憶有更多認識後，志工也進一步參與口述訪談的執行。筆者將讀書會成員們訪談所得，分別從志工提供名單的意義、在訪談過程的角色與臺史博從中發展出的訪談方法，來解讀博物館在其中如何實踐大眾史學理念。

志工們在閱讀許多訪談紀錄後，從自己曾經聽聞的記憶中回溯，認為認識的親人或朋友等長輩有相關的戰爭經驗，並且評估對方的身體狀況與意識是可以受訪的，主動向館員提出可以一起去訪談，來蒐集更多的戰爭記憶。例如一位志工就推薦自己的婆婆來參與訪談，另一位志工則聽妻子曾提及有一位朋友的公公曾接受日本教育，應該有類似經驗，也協助聯絡對方家人與安養院同意訪談。根據本文訪談中王美雯的講述，當時設定的訪談對象其實並不限於臺灣的終戰記憶，若是有經歷抗戰的長輩表示願意受訪，他們也會前往拜訪或是邀

約對方來館參觀受訪，但後續特展篩選資料的階段，由於聚焦於臺灣的戰爭記憶，可能就不會是優先放入的對象。

此時，事實上也達到了臺史博當初設定讀書會的目標——找到更接近大眾經驗的戰爭記憶。因為志工們的家庭背景以及生活環境有差異，無形之間也透過他們每個人的人際網絡，提供多個領域與面向的訪談者，如高等教育、公務人員、市區、鄉間、軍警部隊等，讓受訪者能從館員既有的人際網絡擴展更廣，但由於地緣關係，仍以臺南為主要範圍。

志工願意協助提供受訪者名單，並負責聯繫、擔任中介者，也意外地對博物館提供了另一種幫助，也就是能夠提高受訪者對博物館的信任感。長期與館員們相處的志工能理解臺史博研究之目的，也熟悉受訪者的背景與個性，能居中協調，並讓雙方皆能信任彼此，讓博物館與大眾進行口述訪談的途徑得以被打開：

因為（我）認識他，他多少會講一些，但如果碰觸到比較政治的問題，他們一般也不太願意講。可能是因為那時正好國民政府初期跟日本時代的後期的政治環境的關係，他們比較不喜歡去談論這些問題，但是因為我認識他，他知道我是誰，所以多少會講一點，但是我接觸的（人）大部分也是不太關心。（志工B訪談，2021年5月20日）

王美雯認為，即使長輩並非白色恐怖時期的受害者，但從日本殖民時代以來對於公部門仍有潛在的恐懼感，或許是二戰歷史議題常與當代政治角力有所聯想，因此不願意接受訪談。另一部分是當時環境條件不好，為求生存已經竭盡心力，對戰爭結束時周遭環境產生的變化不太關心，而造成這段記憶的空白。

王美雯提到，在開始訪談前讀書會成員們有規劃大概的架構，但是實際進行時並未按照訪綱，意即是個非結構性的訪談。主要訪談人是由研究員輪流擔任，除了負責連絡受訪者的志工之外，其他人則是視時間許可就會一起參與。

在訪談過程中，負責聯絡的志工主要擔任聯繫博物館與受訪者的中間人，並與其他志工一同學習如何進行口述訪談。但因為是較開放的進行方式，志工有問題也可以自由提問，讓整體進行的氣氛較輕鬆。

實際執行幾次訪談後，志工較為熟悉訪談的操作方式，也根據先前訪談經驗對照當下的狀態來提問，顯示志工開始能掌握訪談問題大綱，並且也較勇於發問與表達。後續也嘗試讓志工擔任主訪人，如志工A、志工D皆有擔任主訪者的經驗。志工D提到因讀書會閱讀的內容及根據之前的表格整理出的資料，已對策展團隊想了解的內容有所掌握，所以訪談時腦海中就有清楚的架構來發問，至於若想了解更詳細，或是認為可以再發展的地方，會由陪同的研究員再繼續接力提問。

讀書會成員進行訪談的方式，也隨著訪談過程中根據受訪者狀況與回饋等，不斷進行滾動式修正。王美雯提到第一次的館外訪談是到一家安養院拜訪，也未特別構想場地、訪問架構或如何引導受訪者，較無設定與其他口述訪談的差異，直到第二次訪談才開始產生變化。

第二次訪談是邀請受訪者至臺史博館內受訪。在圖書室先互相自我介紹，以及了解受訪者的成長背景，並詢問受訪者對日本的印象、終戰那一天的回憶等等，接下來引導受訪者參觀展覽，由於當時臺史博的常設展規劃有關於日本殖民時期的展區，希望博物館物件能夠連結受訪者過去的生活經驗，來喚起受訪者經歷的戰爭記憶。策劃團隊認為這可以有效縮短在訪談時與受訪者熟悉的前置時間，在非結構訪談的情況下碰觸更深層的記憶。臺史博常設展中一些展品諸如原始物件或其仿製品等，是在過去戰時生活中隨處可見的物件，成為口述訪談時觸發受訪者回憶的鑰匙，促使他們回想過去的事件與自己的經驗，從描述誰使用、如何使用物件、什麼時候和在哪裡使用，以及最關鍵的為何需要使用？從人與物件之間的關係重建出受訪者的戰時記憶，進一步連結至背後的歷史。

根據王美雯等（2015）對當時訪談現場的描述，可說是「由受訪者來導覽解說」的獨特情境，由館員與志工們提問，受訪者講解物件用途等知識與自己的記憶，扭轉了一般博物館活動裡博物館人員與大眾之間知識傳達的關係。從另一層面來看，受訪者對物件的描述和個人意義，也在為博物館擴展物件背後的社會脈絡。

因此後來幾次訪談，評估受訪者的身體狀況與交通便利性等，盡可能讓他們到館內常設展參觀。如果是館外的訪談，王美雯就準備相關的戰爭生活物件⁷的圖片，與《寫真報道》的照片以及戰時的一些著名歌曲，⁸讓受訪者可以看到物件圖片、聽到音樂時分享自己的想法和看過或使用過的記憶，而此時志工也會就其訪談經驗或是先前了解的戰爭記憶，主動與受訪者對話，也讓受訪者能有更多的反饋。

我們可能就會拿著那個說，你有沒有看過這個東西，然後你有沒有用過，或是你對他的印象是什麼。那時候當然挑了幾個物件來做這件事情，那我覺得那個效果也還蠻好的，因為有時候志工他也會依照他過去的那些經驗來問，問說對啊，我之前聽我婆婆講他就是沒有拿過，你用到的情形會是什麼之類的。（王美雯訪談，2021年5月3日）

志工向受訪者分享自己從身邊親人，或是讀書會中了解的戰爭記憶，也成為了另一種刺激，讓受訪者得以嘗試重建自己的戰爭記憶，同時也是不同的戰爭記憶之間的互相交流，逐步交織出其集體性的面向。另一方面，受訪者與志工、館員們的訪談，也是一種記憶的交流傳遞，親身經歷戰爭的人們將戰爭記憶傳述給未經歷過戰爭的人們，而志工與館員們將這些記憶記錄後轉化為訪談錄形式的文本，讓記憶以文字記錄的型態被博物館保存。

7 例如千人針、防空頭巾、防空燈泡、漫畫野良黑狗伍長（のらくろ軍曹）等。

8 例如1938年《臺灣行進曲》，1938年純純演唱之《慰問袋》，1940年李香蘭演唱《支那の夜》電影主題曲，改編至臺語歌《月夜愁》的《軍夫の妻》、改編自《雨夜花》的《誉れの軍夫》，1943年《サヨンの鐘》電影主題曲。

根據王美雯等（2015）所述，志工讀書會一共進行了13位受訪者的訪談，其中有8位為志工提供的名單，5位來自博物館既有的人際網絡；來館受訪的10位受訪者中，有9位至展場中參觀。從訪談中蒐集到二戰記憶，讓未有特殊經歷或身分的大眾的歷史記憶能夠納入展覽資料的範疇，尤其補足在既有的文獻資料中相當缺乏的女性觀點。

從這次的訪談行動中，筆者認為可以看到大眾史學的實踐意義。首先，志工主動提出訪談行動，以及願意聯繫與尋找更多的回憶者加入，在原先博物館設計的參與途徑中進一步凸顯了大眾的能動性，他們主動為博物館提供更多的大眾觀點。對於歷史研究上的意義，口述訪談中訪談者的位置，從學者專家轉變為大眾，更鮮明地點出大眾關懷的議題。物件則對大眾的口述訪談，達到輔助與引導、降低訪談人的影響因素，將博物館蒐藏運用在大眾歷史研究，亦開拓博物館資源的新途徑。

（五）志工的歷史詮釋、書寫與個人增能

臺史博透過規劃資料摘錄與口述訪談的行動，發展了一種由大眾（志工）來參與大眾歷史研究的方法，那麼以志工的立場，又是如何思考與看待志工讀書會？在參與讀書會之後，是否對臺灣的二戰歷史產生不同的理解？與館員一同閱讀、摘錄、分享與訪談的過程中，志工們又如何認知與定義自己的行動，與博物館構想的是否有歧異之處？

筆者訪問當時參加「1945年8月15日：那一天 戰爭結束」讀書會的四位志工，初步了解當時他們參與讀書會是基于對臺灣歷史的興趣，但事實上並不是特別對二戰的歷史感興趣。讀書會是因應特展籌備需求所生，志工們能理解臺史博想透過讀書會找到大眾觀點的用意，並理解有時間限制以及「自己整理的資料會變成展覽內容」公共化的壓力，仍然願意實際支持行動。

這次臺史博運用志工讀書會來處理臺灣的二戰歷史，筆者認為除了針對大眾史學的實踐意義之外，也須關注如何在志工讀書會裡討論困難歷史議題所具

有的特殊性。志工們一致肯定在讀書會時，在閱讀資料以及聽別人分享書中內容的過程裡，閱讀各種大眾的戰爭記憶，讓他們對臺灣二戰歷史的知識有更多了解，也能理解不同的人們對二戰、日本統治與戰後國民政府來臺後的心境變化，事實上並非只有「懷念日本殖民時代」或是「歡迎重回中國懷抱」等二種想法，而是由於生命經驗中一直不斷被不同的統治者形塑的價值觀與認同感，以及周遭人們的思想與個人際遇也連帶影響自身的喜惡。

志工們也認為讀書會時清楚地了解自己是在敘述書中回憶者的經驗與記憶，雖然記憶是可能改變或錯置的，但基於尊重，自己不會輕易認定是非對錯或去批判他人的認同。志工們提到大家會有這樣的想法，源於在讀書會剛開始時，謝仕淵與陳怡宏提醒成員必須回歸那個時代的社會脈絡去理解回憶者的思考與行動，去意識到個體之間的差異，有助於志工們脈絡化地理解史料，也能體會到複雜與糾葛，去消解既定的認知框架。

訪談中，志工們也認為讀書會有助於自己的個人專業能力提升。例如志工A本身對於口述訪談有興趣，喜歡與各地長者聊天並了解他們的在地生活與故事，認為在讀書會學習到訪談技巧，讓她可以更有意識地進行個人的研究。另一方面，對於在博物館擔任導覽員的志工而言，從讀書會大量閱讀史料所獲得的知識有助於應用在導覽工作，豐富導覽內容。志工C和志工B皆提到在進行常設展二戰歷史展區的導覽時，可以提供更多詳細歷史知識給觀眾，講述屬於個人記憶的小故事能讓解說內容更生動，也有助於觀眾同理。策展團隊表示期待後續的讀書會能讓志工們擔任主訪人，增進志工們的能動性，讓大眾參與歷史研究能夠更回歸到以大眾為主體的目標。

由此可見，讀書會除了嘗試大眾史學的知識生產型態，另一方面也能帶有一種賦權（empowerment）的展望，並且能夠回饋至志工的服務工作當中，對博物館與志工個人皆有助益。臺史博在設計志工讀書會的操作方式時，降低研究門檻、兼顧入門者學習以及容易獲得成就感列為考量，讀書會前策展團隊分

享與口述訪談技巧教學等，可以確保訪問時有充分的知識與技術，並逐漸發展出主導訪談的能力，其任務導向型態亦隱含了教育訓練的意義，但「1945年8月15日：那一天 戰爭結束」讀書會與坊間常見的閱讀書籍並討論的模式不同，屬於在資料節錄工作期程中，階段性的成果分享，不屬於系統性的課程規劃模式。

與策展團隊訪談時，王美雯也提到與陳怡宏、謝仕淵三人皆認為，一般定義的教育中仍有一個上對下的關係，他們傾向認為志工讀書會中，成員應該是平等的共學夥伴關係，希望志工與博物館一同成長，並期以他們成為對博物館有信任感與情感的中介角色，提供博物館屬於社會大眾的觀點，同時也協助傳遞博物館的理念與價值給社會大眾。

不過以共學夥伴來定義彼此的關係，仍難以避免館員與志工之間的認知差異。在面對掌握較多知識、具有專業權威的博物館員，志工認為館員才是研究的主體，自己則是協助者、屬於輔助性質的角色。對於館方而言，王美雯也坦言由於深知志工們是出自熱情且無償地協助，以及既然視為是平等的共學夥伴，若要去要求志工們工作內容的完整或精細程度，在理性或感性上都感受到困難，而不傾向發揮管理權力來監督，形成一種獨特的權責關係。

對於包含臺史博一系列志工讀書會裡，林佳逸（2018）將研究員的角色視為擔任協助者（facilitator）或適當的參與者（appropriate participant）的角色，⁹引導非專業者參與知識生產。

若延續這個說法來回顧臺史博的三位館員在讀書會當中的行動，以自身的歷史學術專業提供事前的先備知識，設計一個入門者得以執行的研究方式，並引導志工們在讀書會裡互相交流閱讀到的、以及自己聽聞的戰爭記憶。後續也

9 此為林佳逸引述巴瑞特（Jennifer Barrett, 2011）的論述來理解。採用黃貞燕（2011）於〈博物館、知識生產與市民參加：日本地域博物館論與市民參加型調查〉一文中提到，巴瑞特認為在博物館作為當代社會中的論壇（forum），博物館研究員在博物館面對具有公共性的議題，以及知識生產時，應該從原先知識權威的位置轉變。

透過實際訪談來示範如何訪談，並在志工嘗試主導訪談時，扮演協助者。可發現臺史博館員們在「1945年8月15日：那一天 戰爭結束」志工讀書會中，確實運用其歷史知識與研究經驗來引導志工，擔任協助者的角色，尤其主要負責此專案的王美雯，不僅在讀書會裡提供戰爭紀念的相關案例作為知識的補充，在過程中也和志工們一同參與登錄資料，並在所有訪談中陪同參與，為更深度的參與者，負責與志工們聯繫溝通，解決志工們執行上的困難。

同時，也須回顧整個志工讀書會的設計與宗旨，應該關注志工參與這件事本身具有的特殊性。筆者檢視整個讀書會的過程，發現志工們在學習如何閱讀史料及梳理結構時，開始接觸到他人的戰爭記憶，並在讀書會分享自己的經歷時，實際上同時也傳達自身對二戰歷史的記憶及觀點。並且在過程中，能有效擔任聯繫博物館與大眾（受訪者）之間的中介者，志工憑著個人意志做出的選擇，與人際網絡，能提供博物館不同的歷史記憶與觀點，這正是博物館員、其他歷史學者或是一般大眾皆難以取代的價值所在，並且由不同的志工來進行亦會促成不一樣的成果，讓每一位志工的參與，都有其特殊性與意義。

從周櫟楷的大眾史學理論來分析，臺史博的志工讀書會可謂嘗試用一種由大眾（志工）來研究大眾的歷史，包含了「寫大眾的歷史」、「由大眾來寫歷史」的理念。能肯定的是志工參與大眾的歷史研究的過程，志工們找出了其他的大眾（受訪者）並讓他們的記憶能夠進入博物館意圖討論的大眾戰爭記憶的範疇。

為期一年的「1945年8月15日：那一天 戰爭結束」的研究計畫，舉辦了7次讀書會與10場口述訪談，包含159筆文獻史料和13筆訪談，一共建置了172筆資料，再加上臺灣歷史學會訪談共有186筆的戰爭記憶。文獻內容與訪談逐字稿中整理出的資料約有8萬多字，後續以展板內容和影片的形式成為展示內容中展示大眾戰爭記憶的部分。



圖 2 「二戰下的臺灣人」特展主視覺

資料來源：臺史博官網。

三、展覽如何再現大眾戰爭記憶

特展「二戰下的臺灣人」位於臺史博展示教育大樓一樓，展覽一共有八個展櫃，第一個展櫃為主視覺與展覽論述，此外七個展櫃對應七個子題，敘述 1937 至 1945 年戰爭的始末。

展牆背面，是「歷史的那一天 1945.8.15...之後」，即為前述於展覽籌備期間由臺史博志工讀書會進行之關於 1945 年 8 月 15 日終戰記憶的資料蒐集與口述訪談，敘述 1945 年 8 月 15 日戰爭宣告結束的那一天以及終戰後人們的心境。

展覽論述指出，在二戰的總體戰形勢下，臺灣被殖民國日本視為南進基地，為了支援國家戰爭需要動員全部國民及資源，殖民者從精神、人力、物資等各種方式，使臺灣人捲入戰爭當中。在展覽論述中，提到對這次特展三個面向的期望：

本展覽除展示戰時動員外，更關心當時臺灣人的戰時生活，二戰當時臺灣人因為到各地戰場，形成大規模跨區的人口移動，這些事情又對臺灣人造成什麼影響？在戰爭結束時，臺灣人的想法又是如何？在戰爭結束後的 70 年，且讓我們回到二戰的時空，理解烽火下的臺灣人。



圖 3 展覽第一展區

資料來源：臺史博官網。

在「回到二戰的時空」一句也點出了展覽的核心：必須回歸那個時代的社會脈絡去理解當時人們的思考與行動，意識到那無形的戰爭之框的存在。這也是在歷史研究中，記憶能夠提供當代的我們去了解過去人們的認知，以對抗過去單一立場的記述。接下來筆者先針對兩個展區中的展示架構、展品與文字內容進行敘述。

（一）第一展區：大眾視角的臺灣二戰歷史

第一展區運用七個展櫃、七個子題來敘述臺灣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始末。從二戰發生的背景敘述當時軸心國與同盟國陣線的對抗背景以及總體戰形式，屬於軸心國日本帝國下的殖民地臺灣，在這場戰爭中扮演的角色。從整個臺灣社會的物資、人力作為後勤動員，並讓殖民地的人們身心徹底成為日本人、成為帝國的士兵。因此同盟國也曾轟炸過島嶼，留下各種物證。第一展區最終小結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後，臺灣由中華民國政府接收，隨著國共內戰以及後續世界局勢的影響，臺灣又捲入了另一種型態的戰爭當中，又成為了士兵，為新祖國再度踏上戰場。

第二子題「日本帝國下的臺灣——大東亞共榮圈與南進基地」中（如圖4），展出了1941年興南新聞社發行之《最新大東亞共榮圈地圖》（標示1），

與1942年西村真次著《大東亞共榮圈》（標示2），¹⁰內容敘述日本在1938年內閣發表的「大東亞共榮圈」概念，敘述從當時的世界背景，提倡將亞洲從西方國家的殖民體制中解放，以重建亞洲的秩序，強調日本在其中的領頭地位，並提供對共榮圈綜觀的想像。

接下來進一步說明日本如何在民間積極宣傳、形成支持的輿論，以及在大東亞共榮圈的計畫中日本與殖民地各自的經濟與國防定位。臺灣此時被視為向東南亞擴張提供資源的南進基地，《彰化運送株式會社廣告》（標示3）揭示島內的許多產業與建設為此鋪路。《日、滿、中共同攜手復興亞洲宣傳海報》（標示4）是臺灣物產協進會及茶葉統合會議所的廣告，由當時三位知名歌星代言，奧山彩子代表日本、李香蘭代表滿州國、白光則代表中華民國，¹¹背後的三個國旗，也意喻日、滿、中一同建造東亞新秩序。

展板文字內容採用的敘事視角為第三人稱觀點，觀眾以一個獨立於敘事之外的全知觀點，注視著主角——二戰下的臺灣人。觀眾處於後設的、當代的立場，回顧那時臺灣人的遭遇。由於第一部分展區著重在敘述歷史事實，採用第三人稱敘事也提供一個較為客觀的視角來敘述。每一子題的內容都有類似的敘事結構：先敘述統治者的策略，和底下人民如何被影響。



圖4 「日本帝國下的臺灣——大東亞共榮圈與南進基地」

資料來源：曹欽榮攝影，筆者標示編號。

10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1942。西村真次著《大東亞共榮圈》，2010.015.0014。

11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1926-1945。興亞三人娘海報，2013.038.0003。

統治者如何告知人民為何需要這場戰爭，敵人與我方是誰，為何需要消滅敵人，終止敵人過去的壓迫方能迎向國家與人民的美好未來，等論述構成當時戰時體制的認知框架。

例如第三子題「成為日本人——皇民化運動下的臺灣人」（如圖5），描述為戰爭動員所需，總督府進一步在臺灣推行皇民

化運動，從宣傳政策的文宣與照片中可以看到官方從教育、語言、文化、宗教等各處著手，為使臺灣人民的身心皆能對日本產生認同。

磚牆上與斜立的平臺上有「勞務奉公會員狀」（標示5）、「皇民奉公會宣傳漫畫」（標示6）、「皇民奉公會推進員紀念章」（標示7）等文物，說明當時官方的最大推手是皇民奉公會。臺灣警察協會發行《臺灣保甲皇民化讀本》其中之目錄頁（標示8），敘述保甲壯丁團應該如何推行皇民化。

「國語講習所獎狀」（標示9）、來自《寫真報道》的「『學國語！學國語！』全民說國語情形宣傳」（標示10）、皇民奉公會臺北支會發行的「臺灣一家國語」的匾額（標示11），說明當時語言政策不只在學校教育中實施日語教育，更是遍布社會教育和日常生活中，加速日語在整個社會中普及。

「臺南州嘉義市豐田家戶籍謄本」（標示12）敘述1941年一戶姓吳的人家，全家五人皆改姓豐田，顯示當時改日本姓名的風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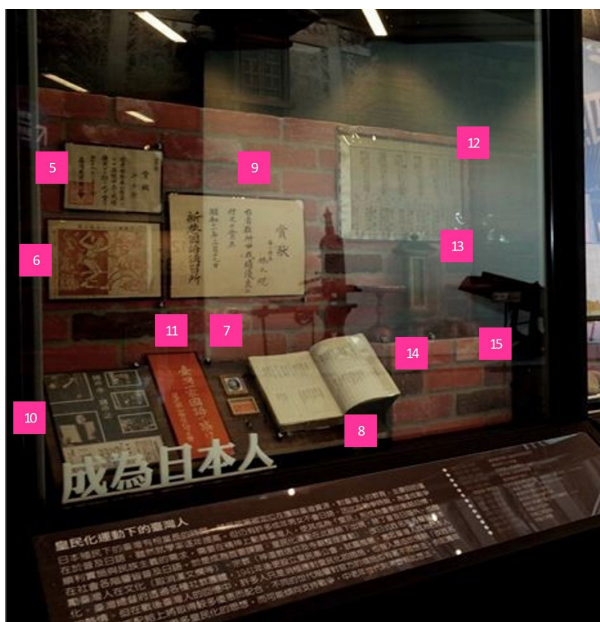


圖5 「成為日本人——皇民化運動下的臺灣人」展櫃
資料來源：臺史博官網，筆者標示編號。

「神龕之神主牌」（標示13）、「高腳盤」（標示14）與「燭臺」（標示15）代表當時的精神動員不止於教育，宗教也受到干涉。此時也因不同世代與社會階層的國族認同，對於政策有積極配合與消極應對的差異，如融合日本神道與神祖牌的神龕即可看到當時人們如何採以折衷的方式去應付政策。但從展板文字中提到，例如當時配合改姓名的人可以在各方面獲得較多的優惠或福利，尤其在戰爭末期、物資日漸匱乏的日子裡，為求生存人們也只能接受。

面對這樣的框架與實踐的政策，人民可能順應，但順應的理由為何？或許為了長期受到差別待遇、被視為次等國民的臺灣人爭一口氣，或許僅是求生存；選擇對抗的話，臺灣人又如何發展出一套對應方式。透過這幾個子題層次地從社會面向去闡述「臺灣被捲入二戰當中」的狀態。

在第五子題「櫻花墜落——人力動員與海外參戰經驗」（如圖6），描述臺灣青年也在政令宣導下先後以不同的身分投入戰爭之中，志願從軍、接受徵召，或是參與後援部隊、兵工廠等，與當時的年輕一輩對殖民國的認同、為爭取與內地人同等地位的想法有關。

從官方提供的宣傳標語、報章雜誌等如何鼓吹臺灣青年加入軍隊，如1943年《寫真報道》1月8日號封底（標示16），言簡意賅地宣傳「身為日本男子的最高榮譽即是參加志願兵」，除了說明為國奉獻的光榮，對殖民地的人們，更隱含著成為真正日本人的勸告。展覽也展示了1943年朝日新聞社編的《大東亞戰爭及臺灣青年寫真報導》其中一頁（標示17），描述臺灣青年們加入海軍志願兵、為國奮鬥的熱血模樣，也包含海軍志願役的訓練情景、訓練之外與家人相處的寶貴時光，並敘述「參與志願兵的光榮是在過去的臺灣無法見到的光景。」。另外臺灣總督府的「神風攻擊隊持續吧！標語」（標示18）宣傳鼓舞神風特攻隊的戰略。

「新竹州青年動員訓練召集告知書」（標示19）敘述為求有充沛人力動員，而將學校作為集合地，訓練街庄裡的青年男性。在展示中首先印入眼簾的

「淡水中學贈從軍者簽名太陽旗」（標示20），以及展覽提供主視覺圖像的「臺灣東勢子弟入伍前家庭合照」（標示21）描述了如何從臺灣男子轉變為日本軍人，眾人在祝賀武運長久的旗幟上簽名，並與家族合影，成為當時一種儀式性的留念與祝福。

最後，轉向了不幸戰死於前線的臺灣人。「1944年間戰死之臺灣人日本兵林清春遺物盒」（標示22）¹²為捐贈者的兄長林清春不幸遭遇空襲去世，軍方寄回骨灰與裝著遺物的木盒，家人將骨灰安葬後一直將木盒保留至今，只為留下紀念兄長的證明。「戰沒遺族之家」（標示23）則為提供給戰死於戰爭軍人遺族掛於玄關的鋁製牌，在當時會受到周遭的人敬重。

展覽敘述中並未直接敘述臺灣人的想法，而是從當時的社會背景說明，讓觀眾進一步去推敲其緣由。例如響應國語運動，提到當時總督府提供給國語家庭較多的福利；志願兵的熱潮，則說明那時推行皇民化不遺餘力，年輕一代從小受日本教育而深信祖國的強盛，當時的環境從各式文宣裡大力宣傳成為日本兵的光榮，而不難了解當時他們願意參軍的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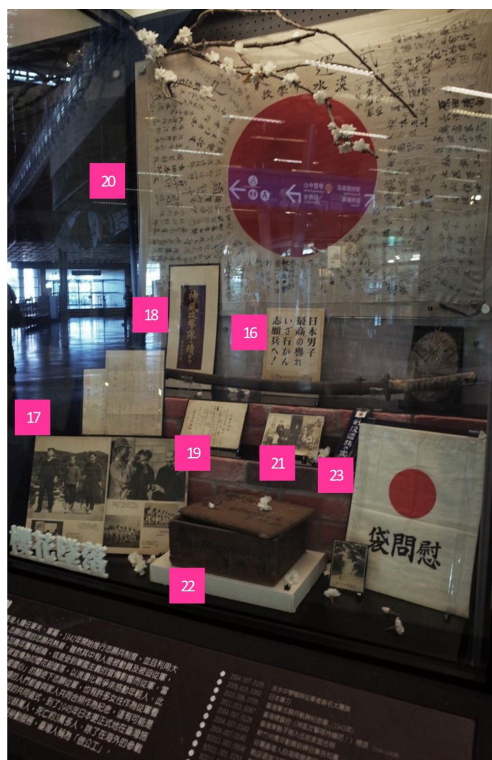


圖6 「櫻花墜落——人力動員與海外參戰經驗」展櫃

資料來源：臺史博官網，筆者標示編號。

展覽敘述中並未直接敘述臺灣人的想法，而是從當時的社會背景說明，讓觀眾進一步去推敲其緣由。例如響應國語運動，提到當時總督府提供給國語家庭較多的福利；志願兵的熱潮，則說明那時推行皇民化不遺餘力，年輕一代從小受日本教育而深信祖國的強盛，當時的環境從各式文宣裡大力宣傳成為日本兵的光榮，而不難了解當時他們願意參軍的理由。

¹² 林清春遺物盒的故事，參考自黃裕元〈木盒裡的哥哥：塵封七十年的臺灣戰爭記憶〉，<https://storystudio.tw/article/gushi/my-brother-in-the-box/>，2021/5/29。以及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1944-1945。1944年間戰死之臺灣人日本兵林清春遺物盒，2013.027.0001。

筆者也發現，從展品當中，雖然目的在敘述歷史背景，但可觀察到所有的展品幾乎都是選自那個時代在民間生活中「可見」的物件，例如欲敘述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選擇以大眾通俗出版物為取向的臺灣藝術社所出版之世界地圖，以及漫畫海報，總督府委託朝日新聞社編輯出版的《寫真報道》，政策宣傳的廣告海報、報章雜誌中擷取的文章或廣告頁面，或由奉公會或自衛團組織等推行，呈現大眾是如何接收到這些資訊，以常民可見的物件去建構出戰爭歷史，創造出這段歷史中屬於大眾的視角。另一個特點是，如展覽論述所述，展示著重於「臺灣人在二戰中如何被動員」，採用的展示策略並非列出二戰時臺灣人參與的戰役、或是用戰場照片等敘述前線的腥風血雨與悲壯，而是將視線始終鎖定當時在「後方」的臺灣島上，了解整個臺灣社會在體制下如何被殖民母國要求支持戰爭，特別的是即便是「櫻花墜落——人力動員與海外參戰經驗」敘述臺籍日本兵與工班等人們前往海外的戰場和兵工廠等子題裡，展品亦選擇入伍前合照、慰問袋、家書，在島上的人們無法直接了解戰場的情況，只能夠透過這些物件與在前線的人們溝通。

展品也大致依循「動員的體制」分為兩類，一為官方為營造戰爭正面觀感的宣傳，二為執行政策時的證明。延續前面所述敘事結構中的統治者策略，可以發現形塑臺灣人的價值觀，是每個子題裡都會有的部分，呼應臺灣人被動員的主旨。展品中唯有「1944年間戰死之臺灣人日本兵林清春遺物盒」是屬於明確的戰爭紀念物的存在，也在敘述這段歷史時注入了悼念情感。同時亦可察覺，部分展品有明確的所屬者，除了透露臺史博從大眾捐贈文物的蒐藏脈絡，也將敘述「集體」臺灣人的經驗聚焦轉至一個家庭、一個人身上。但即使選用具有署名的真實物，展覽所意圖呈現的仍然是以臺灣人為主體、一種敘述這樣的經驗是具有普遍性的集體記憶，此時的個人成為了臺灣人的縮影，是印證此歷史事件真實存在的證據。署名宛如展品的註解般，強調擁有這段記憶的人物實際存在，佐證這些歷史記憶的真實性。

從當時戰爭動員情況，來描繪當時臺灣人在總體戰中的群像，以及被形



圖 7 展覽第二展區和展櫃上方印製的航照圖

資料來源：臺史博官網。

塑的認知框架，同時也為背面的大眾戰爭記憶的展示，提供時間軸線與事件背景敘述，先行布置時間與空間的座標，呈現當時臺灣人們共同的集體記憶的層面。

（二）第二展區：展示大眾的戰爭歷史記憶

在展櫃背面的「歷史的那一天 1945.8.15...之後」展區，採用當事人的記憶作為主要展示內容，讓原先第三人稱展覽敘事轉變為第一人稱的敘述視角，如戰爭紀念館中常見的個人證言作為過去事件的見證者，但相對於紀念館中常以個人記憶作為整個集體的代​​表來印證創傷記憶的集體性與普遍性，臺史博則是意圖透過展示個人記憶呈現多元性，但另一方面這些個人記憶也象徵著某一個社會群體，亦是臺史博希望能涵蓋社會中不同人物的戰爭經驗。延續第一展區從戰爭動員的角度，讓論述戰爭的主體從高度參與戰爭的軍人、軍伕等，擴散到戰場之外的社會群體，來達到臺史博所認為的「大眾」。除了文字之外，還設置有五個平板電腦，播映當時委託臺灣歷史學會拍攝的影片。

展示內容來自志工讀書會時所整理的那些戰爭記憶，而採用的展示方式是直接摘錄表格中的記憶內容，將回憶者的當時的身分資料、所處地點與資料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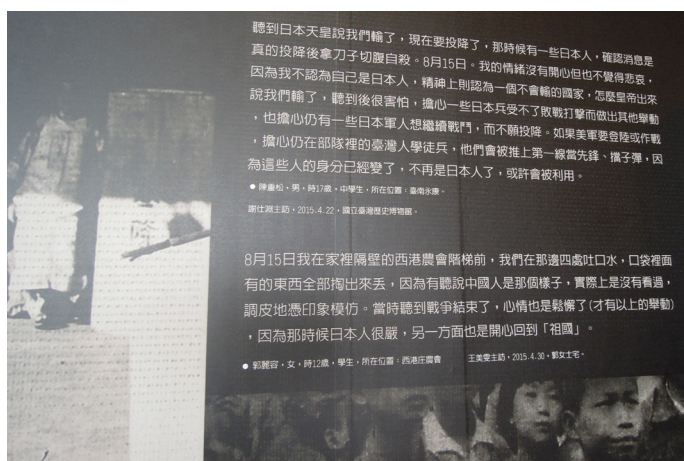


圖 8 展板的戰爭記憶呈現方式

資料來源：王美雯攝影。

源，也一併呈現在展板當中，博物館也未再對資料進行更多的文字說明與詮釋，展板上僅有標題的「歷史的那一天 1945.8.15...之後」一句，並無其他前導文字或是論述。

策展人陳怡宏提到試著降低策展人的詮釋，主旨聚焦在呈現多元的記憶。根據志工讀書會整理出來的表格中，沿著欄位中找出不同地點、年齡、職業、性別，以及不同情緒表現的人們，最終選擇了26位回憶者的記憶。

謝仕淵也同樣提到在展覽中降低策展人詮釋觀點的部分，並且認為在設計讀書會的表格時，已經將臺史博如何詮釋大眾戰爭記憶的想法融入，展示看似直接呈現，事實上早已蘊含著詮釋觀點。

我覺得當一個要去呈現資料多元性為展示主要內容跟訴求的時候，其實我覺得策展人對歷史詮釋的涉入，並不是最深刻的。當你決定資料要這麼展的時候，個別欄位被萃取出來的時候，某種程度它已經決定你之後這批資料跟這個展覽會怎麼談這批材料，跟談這個事件的觀點。因為在決定欄位的過程，你已經在把多元座標制定出來了。（謝仕淵訪談，2021年4月22日）

陳怡宏也提到篩選資料的困難性，既希望能看到各個欄位屬性的差異，又希望能夠讓每一個欄位的回憶者數量盡可能一致，但礙於幾個欄位的比例懸殊，例如女性的回憶者與男性的數量差異極大，在策展當時蒐集資料的階段難以達到理想中的平衡，經過許多考量與刪減後，才呈現最終觀眾所看到的版本。

從展示的記憶當中，該如何解讀臺史博想呈現的多元？如展示中序列最前的綢仔絲萊渥，為少數的女性回憶者之一，並且為唯一的原住民、唯一的農人，敘述那一天28歲的她如往常上工，工作結束時警察召集大家，引述報紙的內容告訴大家戰敗，而眾人十分傷感。對比之下，在綢仔絲萊渥記憶的展板下方是一位當時12歲的臺灣女性柯蔡阿李的記憶。

收音機突然傳出國歌，大家都嚇一跳，暫停手邊的動作，愴愴地站著，聽到天皇陛下出來講話了，無條件投降。我們那時候都已經被訓練得很愛國了，一聽到大家都開始哭。哭說：「咱日本輸去阿，那時陣不知道自己不是日本人。」¹³

柯蔡阿李從收音機裡聽到玉音放送得知戰敗，那時她與眾人一起為日本戰敗哭泣，呈現了不同世代、族群之間卻具有同樣的情感，同時她也提供一個在當代回望過去的觀點：「那時不知道自己不是日本人」，這是在既有的戰爭之框被轉變、或是被消解時，才能表達的想法。

不過同樣12歲的郭麗容卻完全相反，則與同伴歡慶，因為戰爭結束意味著日本的高壓統治結束，並期待「祖國」中國的接管。

8月15日我在家裡隔壁的西港農會階梯前，我們就在那邊四處吐口水，口袋裡面有的東西全部掏出來丟，聽說中國都這樣。那時候只是有聽說中國人是那個樣子，實際上是沒有看過，調皮的憑印象模仿。

13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柯蔡阿李訪談稿，未刊行，2015。

當時的心情聽到戰爭結束了，也是鬆懈了（才有以上的舉動），因為那時候日本人很嚴，另一方面也是開心回到「祖國」。¹⁴

同樣位於臺灣島上、同樣族群與同年齡的女孩之間卻有截然不同的情緒，也令人產生「為何會如此」的疑問，但答案也已經在他們所敘述的記憶當中，「我們那時候都已經被訓練得很愛國了」、「因為那時候日本人很嚴，另一方面也是開心回到『祖國』」，根源於那時對原先統治者的認同與否，這與過去的殖民政策有密切的關聯。也能發現，戰爭結束時回憶者表達的情緒，成為理解回憶者的第一道線索。

對於在海外的臺灣人而言，或許是與戰場的距離更近，一致對戰爭結束感到喜悅，尤其當時身為陸軍特攻隊儲備最後一批的飛行訓練生賴泰安，敘述那時和同袍們一開始無法置信戰爭竟然結束，但也意味著自己不用搭上特攻隊飛機、得以生存感到開心，「這是因為雖然在表面上大家都逞英雄發下豪語說：『總有一天我也要坐上特攻機，並英勇地撞向敵艦！』不過內心卻一直想著：『我還不想死……』。」這段記憶來自陸軍特攻隊儲備最後一批的飛行訓練生賴泰安。¹⁵在戰爭結束時，少年們終於能發自內心地表達真實的想法，不必再對囿於國家大義抹殺自己的情感，筆者認為是最能表現出跳脫戰爭之框的記憶。而這些海外臺灣人感到不安的主要有兩件事，一是對可以回歸認定為祖國的中國而感到開心，但對中國仍然陌生；一是擔心被日本形容得十惡不赦的美軍登陸後會傷害他們，但卻發現美軍對他們很友善，意識到與原先認知的差異，也逐漸消解日本給定的認知框架。

相對之下，海外臺灣人的戰後記憶卻是滿滿的辛酸故事。首先是當時他們已不再是日本人，卻還不是中國人，不清楚自己國籍定位的尷尬身分，讓他們光是要如何遣返回臺就是棘手的問題，有人被捨棄在他鄉數個月甚至是數年，

14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郭麗容女士訪談稿，王美雯主訪，未刊行，2015。

15 賴泰安，2014。出發吧！少年飛行兵，頁：417-420。臺北：楓書坊文化。

只能盼著他人伸出援手，或是自行努力掙錢，私底下雇船回臺。同時也對自己前途迷惘，面對語言、思想與制度完全不一樣的新統治者到來，不知道該跟隨前祖國日本，還是回故鄉接受新祖國的統治，同時與中國軍人之間衝突等潛在問題也逐漸浮現，讓他們對未來更加不安。

在等待中國中央軍前來接收前，臺籍日本兵不斷聽到「祖國」的呼喚，中國軍隊以戰勝國姿態下令日軍釋出臺籍的軍人、軍屬（部隊的技術人員），共約兩萬人，分別集中在五處軍營「照顧」。眼看著戰敗國的日本兵，一批又一批遣返，被納編為戰勝國的臺籍軍人、軍屬，卻只能望眼欲穿，心情從期待、落空到跌落谷底，更可怕的是中國軍人與臺灣軍人的矛盾逐漸浮上檯面。¹⁶

戰後，日本軍接受國軍的命令維持原先的武裝協助維護當地治安，我們這些準備回臺灣的原日本軍被收容在一處，但過了一年仍沒有消息，最後，一部分的人自己出錢雇了一艘戎克船，九死一生的回到臺灣。戰時總覺得生與死沒有差別，但能夠活下來真是太好了！¹⁷

特別的是，展示中還挑選4位當時在臺日本人的記憶，以臺灣軍的身分敘述在軍中所見的終戰情況，具有兩個層面的意義：一為提供有臺灣認同的日本人的觀點，一為敘述在臺灣的軍方高層想法。終戰當下記憶的部分，分別敘述聽聞終戰時感到鬆了一口氣，以及對於日本戰敗感到不敢相信，周遭的人們陷入沉默或直接地表達悲痛。在戰後記憶，則敘述逐漸感受到前來接收的中國人對他們的敵意，雖然曾想過要留在臺灣，但多方思考後最終還是決定回到日本。這個戰後記憶來自村杜正朔發表於1993年的《旭陵會會報》的校友證言，意即他是嘉義中學校之畢業生、有在臺灣的生活經驗，讓他對於臺灣有歸屬感

16 此段摘錄於展板文字，黃金島訪談稿，資料出處：陳銘城總策劃，張國權執行主編，1997。臺灣兵影像故事，頁：90-91。臺北：前衛出版社。

17 此段摘錄於展板文字，吳錫煌訪談稿，資料出處：旭陵會會報，1989年7月1日。東京：嘉義中學校同窗會旭陵會。

卻必須離開的惋惜，但也側寫了當時中國人對日本人的不友善。

辦公廳的頭像由陛下換成孫文像，每天都唱著三民主義，雖然不適應急速轉變的生活環境且歸心似箭，但為了過去臺灣人所給的恩情及不浪費占用米糧，我告訴自己：「需要好好的工作」，同時我也曾考慮是否要一直留在這裡，但最後考量孩子們的教育與將來、安定的生活條件、生命財產等還是決定回日本。¹⁸

也有像是春見二三男的例子，當時在臺灣的司令部情報班值勤，他提到戰後為了避免重要軍情資料外洩或是被美軍虐待，被長官下令自盡，對戰爭結束後仍要為國家而死的想法感到不可思議，這段敘述也再一次印證當時「一切為國家」的口號之中視人民的生命為草芥，尤其在今日注重人權的普世價值觀看來更顯得無比荒謬。

從前述的記憶當中，看到臺史博想呈現的觀點，是人們對戰爭結束的想法並不是全都圍繞著國家的勝敗，想活下去是人的本能，想要有美好的未來也是能夠理解的想法，可是過去的戰爭之框造就他們無法暢言，或是相反的，將國家勝敗視為足以左右自己生命的意義，是因為將國家戰敗與失去美好未來劃上等號的聯想，因此必須先意識到當時的社會脈絡為國家動員的體制，才能展開多元記憶與彼此對話的可能性。

展覽中播映五部以大眾戰爭記憶為主題的口述訪談影片，主題依序為：戰時城鄉經驗差異與動員、外地臺灣人的戰爭經驗、戰爭時期生活史的變化、戰爭時期文化統制、戰爭時期小故事。各個平板搭配有頭戴式耳機，讓觀眾可以聽受訪者敘述自己的回憶，影片中也穿插臺史博提供的史料照片、美國國家檔案館的影片檔等，如受訪者提到的物件，或是空襲時美軍拍攝的航照影片，作為補充說明。

18 此段摘錄於展板文字，村杜正朔訪談稿，資料出處：旭陵會會報，1993年1月1日。東京：嘉義中學校同窗會旭陵會。

影片形式提供不同的觀展體驗，尤其見證者親口述說那段記憶，經由回憶者親自敘述，並且從他們的表情、聲音、語氣、肢體動作等，更鮮明地傳達他們的情緒，賦予一種親近感，也更意識到這個記憶來自一位真實人物。同時也有還原受訪者的語言和使用的詞彙、敘事方式的這項優點，如以閩南語、客語，甚至夾雜著日語等，降低記憶在文本化時的修飾程度。

尤其戰爭時期小故事的部分，也適度在回憶戰爭時的沉重氣氛中增添一點輕鬆的趣聞，除了展現當時臺灣人在物資缺乏又必須崇尚儉樸的時期，活用智慧滿足生活所需，也敘述人們終戰後政權交接之際，臺灣民間仍然維持著極佳的治安，另一方面也想像著將來美好的生活與嚮往著自由的空氣，對未來充滿期待。

從回憶者的自傳、回憶錄與口述訪談等，找到近年來逐漸跳脫國族框架的戰爭世代的大眾觀點，但如前述，這些資料幾乎圍繞著如軍人、軍伕等具有軍事身分的回憶者，或是有特殊經歷的人們。此時，志工讀書會口述訪談獲得的記憶便派上用場。選用的4位回憶者當中，有3位學生，1位無線電臺技術人員，年齡為12至17歲之間。

戰敗前一、兩天已經確定輸了，日本人同事要我偷聽中國那邊的電臺的臺語廣播，我也聽不太懂他們講什麼，宣布當天我們在電臺聽到玉音放送時沒甚麼感覺，只感覺到輸了。日本人聽到立刻淚流縱橫，那天我回家立刻告訴阿公，阿公在此之前就預料日本會輸，因為他覺得美國是個富裕的地方……¹⁹

聽到日本天皇說我們輸了，現在要投降了，那時候有一些日本人，確認消息是真的投降後拿刀子切腹自殺。8月15日。我的情緒沒有開心但也不覺得悲哀，因為我不認為自己是日本人，精神上則認為一個不會輸的

19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郭清來訪談稿，志工A主訪，未刊行，2015。

國家，怎麼皇帝出來說我們輸了，聽到後很害怕，擔心一些日本兵受不了敗戰打擊而做出其他舉動，也擔心仍有一些日本兵想繼續戰鬥，而不願投降。

如果美軍要登陸或要作戰，擔心仍在部隊裡的臺灣人學徒兵，他們會被推上第一線當先鋒、擋子彈。因為這些人的身分已經變了，不再是日本人了，或許會被利用。²⁰

這些口述訪談提供了當時在戰線後方、一般社會大眾對戰爭的想法，尤其如郭清來轉述了爺爺對日本戰敗的解釋，間接也提供了一些現在無法採訪到的、當時高齡者們的想法。

對照其他當時在島上的臺灣人的回憶，戰後積極參與民主運動的知名企業家王桂榮當時是個13歲的學生，敘述聽聞終戰時母親和鄰居都很高興，自己則難以置信，認為日本不可能輸；身兼企業家與省議員身分的洪掛當時已年屆40歲，提到周遭的人沒有什麼情緒，由於鄉下貧困，沒什麼消息管道，對終戰消息半信半疑。臺灣人若對日本戰敗表示開心，會擔心被警察刑罰；長期參與自治運動的林獻堂更是完整地看著臺灣度過日本統治的50年，這位65歲的商人以文言文融合日語寫下日記，日本以武力占據臺灣，也因軍事行動失去臺灣，和親友討論時皆認為「沒想到這麼快就發生了」。²¹

檢視臺史博所選擇與呈現的大眾究竟指稱什麼樣的人們、包含哪些社會群體，由現今的思維和個人的記憶共同構成，人們在回憶的同時也會帶著當下的價值觀進行判斷與敘事，意即必須將回憶者當下與今日的身分、人生際遇與當代的社會脈絡等一併考慮進去。這也呼應「歷史的那一天 1945.8.15……之後」標題中「之後」的命題，不僅敘述時間概念上的戰後際遇，更意味著戰爭世代的人們從當代回顧過去的動態過程，也就是歷史記得（historical

20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陳重松訪談稿，謝仕淵主訪，未刊行，2015。

21 原文為：「水來、五弟、攀龍、雲龍、培英共論此事，不意其若是之速也。」

remembrance)，²²由於記憶具有的變動性，當下的價值觀影響他們對過去的觀點，戰後的際遇以及對後來統治者的評價，讓回憶者們看待這段過去時，也會產生不同的詮釋。如在政權交接初期臺灣人看到當時國民政府軍紀敗壞，反而開始對日本殖民帶來的現代化感到懷念。

無論是戰後成爲具有極高政經地位的人物，因參與公共事務而遭遇當局迫害的人們，或是始終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努力且平凡地生活的人們，都是擁有參與歷史之權利的「大眾」，而這些大眾也呈現出世代間具有共同性與差異性的二戰歷史觀點。

從「二戰下的臺灣人」特展中，第一個展區運用與大眾關聯的展品說明當時的背景脈絡、戰爭框架所形塑臺灣人共同的集體記憶，銜接至第二展區個體記憶間的對話，呈現出這些記憶中同時存在具有差異化的個人經驗與理解，承載著這些經歷的人們透過臺史博對戰爭記憶的蒐集，讓這些過去重新進入公共的視野當中，呈現戰爭歷史的多元。

四、結論

「二戰下的臺灣人」當中，選擇重新連結戰爭與被捲入戰爭的人，運用集體與個體的記憶來驗證當代社會必須面對臺灣二戰記憶存有歧異的事實，細緻地透過戰爭相關的物件、紀念物，以及大眾的記憶，映照出戰爭帶給人們日常的中斷，失去至親的痛苦，身爲殖民地人民更因爲戰爭的結果成爲政治籌碼，呈現一種超越戰爭之框的戰爭歷史書寫。

倘若過去臺史博常設展裡「烽火歲月——戰時生活」展區的出現，意味著屬於臺灣日本殖民時代的戰爭歷史終於得以從「去日本化」的政策脈絡下擺

22 關於 Jay Winter (2006) 所提出之 historical remembrance 一詞，由於根據 remembrance 之詞性譯為歷史記憶，則無法看出與 historical memory 之差異，曹欽榮 (2020) 則譯為歷史的記得，而筆者選擇採用歷史記得是爲保留 Winter 所強調「對抗遺忘」之意，並包含從今日（當下）的位置回想過去的動態性。

脫，出現在當代社會的公共視野當中，筆者認為特展「二戰下的臺灣人」則表現出一種多元化的戰爭歷史觀點之可能性，人們不一定要贊同戰爭是等同於為國家光榮、為集體利益奉獻，可以認為戰爭就是一個公共暴力事件，是國家對人民、國家對國家之間的合理化暴力，人們積極參與和否定戰爭，都有其更接近人性的理由所在。而「二戰下的臺灣人」從第一展區敘述戰爭之框如何形塑成世代的集體記憶，至第二展區從個體記憶中的多元來消解戰爭之框，呈現了一種超越框架的戰爭歷史敘事。同時這些多元的記憶與生命故事，更能將紀念的意義得以深化，為每一個因戰爭而受傷的生命哀悼。

此外，也看見臺史博在生產展覽的過程與展覽，分別實踐了周櫟楷所提出大眾史學的三個層面之理念，包含：「寫大眾的歷史」，臺史博展示大眾的戰爭相關物件與歷史記憶、嘗試呈現二戰中的大眾，以及大眾所見的二戰；「由大眾寫歷史」，臺史博規劃志工讀書會作為志工參與資料蒐集的取徑，並且由志工協助找出身邊的回憶者，讓具有普遍性的大眾戰爭記憶進入資料範疇；以及「為大眾寫歷史」，以展覽書寫大眾的臺灣戰爭記憶。在志工讀書會中可以觀察到，志工的參與讓博物館在進行時得以擴展更豐富的歷史觀點，並提高受訪者與博物館之間的信賴感。另一方面對於志工而言，也是一種對二戰歷史、歷史研究的學習與個人增能。對博物館也是讓大眾參與行動當中的學術意義可視化，讓成果轉變為一種博物館資源。

在「二戰下的臺灣人」案例當中，透過讀書會摘錄史料的行動，將過去回憶者們書寫，或是被訪談者書寫下來的個體記憶匯聚，以類似檔案化的方式梳理，並藉由資料結構化的處理，各種不同的社會群體的集體記憶得以被看見，這件事的意義在於，臺史博將抽象的、概念上的「大眾」轉化為具體指涉的群體，使得談論「大眾」的戰爭歷史不再飄渺，或受到權威者的刻意滲透。筆者認為這些資料之間可提供一種互為經緯地解讀集體記憶的模式，看見回憶者的身分背景、人生際遇所造成他在終戰這一天如何思考，亦可逆向地從終戰記憶中回溯，了解回憶者對認知是受到怎麼樣的社會脈絡所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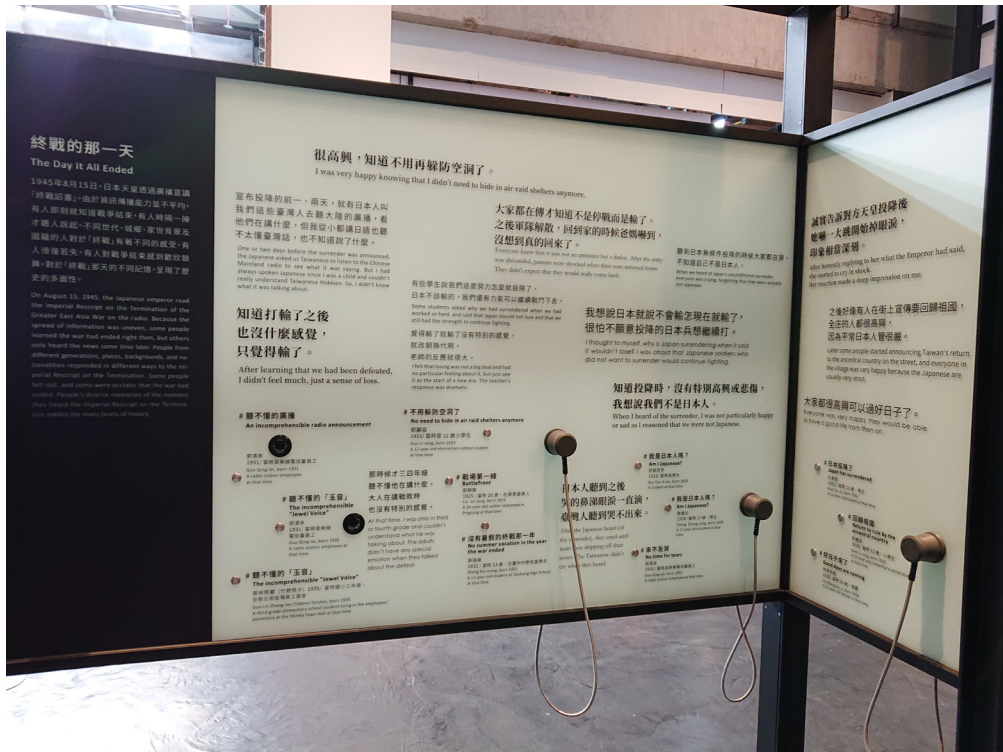


圖10 2021年臺史博常設展更新，「終戰的那一天」展板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同時，在選擇哪些回憶者的記憶成為展示內容時，博物館作為策展當中掌控話語權的權威角色，還是無法避免主觀性的存在，但藉由讀書會的結構化資料，讓策展人在選擇記憶時有得以參照的根據，降低個人判斷的影響程度，並適度的讓代表不同社會群體的大眾皆能被呈現。

在2021年初臺史博常設展更新，在「新秩序下的苦悶與夢想」展區裡描述關於日本殖民時期的二戰歷史，在展板裡也放入當初「二戰下的臺灣人」讀書會整理的戰爭記憶，成為「終戰的那一天」的展示內容。除了以文字呈現摘錄的記憶內容，也運用口述音檔，讓觀眾可以透過聽筒親自聽到回憶者敘述他們的終戰記憶，提供更豐富的觀展體驗。

與當初2015年特展明顯不同的是這次常設展所選擇的回憶者，都是志工讀書會口述訪談行動當中的受訪者，讓讀書會的訪談成果得以較完整地呈現，也讓展示的大眾的戰爭記憶更加貼近常民經驗。為臺灣的二戰歷史展示跨出了重要的一步——大眾的戰爭記憶終於得以在博物館的常設展中被長期展出，無須跟隨周年紀念活動，讓更多人有機會接觸到臺灣的大眾二戰記憶，看見戰爭記憶當中的多元性與回憶者複雜的情感。

在今日，人們應該在戰爭歷史中理解什麼，以及當代紀念戰爭的意義，仍然是許多博物館不斷探討的問題。博物館作為具有公共性的文化機構，再現戰爭歷史時為滿足不同受眾的需求，甚至難以避開政治立場的考量，但我們依舊期待在社會中出現得以呈現多元戰爭觀點的公共空間，並且有更多跳脫戰爭之框/國族之框、重視生命之脆弱的戰爭歷史敘事讓大眾看見，讓當代人們在紀念的同時，理解戰爭作為公共暴力事件造成日常的中斷與生命的逝去，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並反思戰爭，傳承戰爭記憶、抵抗遺忘。

引用文獻

1. 王美雯、陳怡宏、謝仕淵，2015/10/25。戰時生活物件與臺灣人的戰爭記憶。戰爭與記憶：亞洲地區的經驗與論述，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南瀛國際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臺南：臺南成功大學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三演講室。
2. 汪宏倫，2014。東亞的戰爭之框與國族問題：對日本、中國、臺灣的考察，汪宏倫主編，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頁：159-225。臺北：聯經。
3. 周婉窈，2003。「世代」概念和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史的研究，當代，188：64-77。
4. 周樑楷，2004。大眾史學的定義和意義，周樑楷編，人人都是史家：大眾史學論集第一冊，頁：23-36。臺中：采玉。
5. 林佳逸，2018/7/5。公眾史學與博物館志工經營——以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歷史那一天」志工讀書會為例。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107年度博物館與臺灣史論文發表會，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行政典藏大樓4樓會議室。
6. 陳怡宏，2015。二戰下的臺灣人：總體戰的生活記憶，WatchTaiwan 觀·臺灣，26：14-22。
7. 曹欽榮，2020/10/24。博物館的戰爭與和平——詮釋記得與遺忘的敘事。臺灣近代戰爭史第10屆學術研討會，許昭榮-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臺北：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一樓展演廳。
8. 黃貞燕，2014/7/7-2014/7/12。博物館、知識生產與市民參加：日本地域博物館論與市民參加型調查，頁：159-187。「2014年走入歷史田野——博物館、歷史物件與記憶」工作坊，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9. 謝仕淵、王美雯、陳怡宏、劉維瑛，2017。2014-2015年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灣史研究，24（2）：179-233。
10. Bulter, Judith. 著，何磊譯，2016。戰爭的框架。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
11. Wineburg, Sam., Martin, Daisy. and Monte-Sano, Chauncey. 著，宋家復譯，2016。像史家一般閱讀——在課堂裡教歷史閱讀素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12. Winter, Jay. 2006. *Remembering War: The Great War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Rewrite the History of War: A Case Study on the Temporary Exhibition “Taiwanese During World War II” of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History

Ya-jou Chen*

Abstract

War history is often written from a national standpoint in order to construct a unified identity, and focuses on political and military leaders, but rarely recounts the war experiences of the general public. In recent years, research on the public’s war memory has helped the narrative of war history to break away from the frame of nationalism, to see the complexity of war, and to reflect on the state violence behind it. A display of war history in a museum allows us to think about the meaning of war and helps us to understand war history in contemporary times, commemorating and passing on the memory of war.

The research adopts the 2015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History’s temporary exhibition Taiwanese During World War II as a case study. The exhibition used the public’s objects and memories about war, to present to the public the period of war and to illustrate the public’s opinion of war. During the

* Master, Graduate Institute of Museum Studies,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Received: Jun. 26, 2024; Accepted: Oct. 18, 2024

preparation process, the museum organized a study circle, inviting their volunteers to participate. Using a study circle is a method to collect data and through public participation to collect the public's memories of the war. This study explored how the museum could present the public's viewpoint and the historical writings of war beyond the frame of nationalism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public history during the preparation process and exhibition.

Keywords : War Memory, Public History, Exhibition of War History,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History, Historical Writing